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总主编：周德生
陈新宇

「运气与药诀」

释义

主编 周德生
李美珍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总主编：周德生 陈新宇

「运气药诀

粹义

原撰清·吴谦
主编周德生 李美珍
副编钟捷 张超群
编委周德生 李美珍
钟捷 张超群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运气药诀》释义 / 周德生、陈新宇总主编.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ISBN 978-7-5377-3774-6

I . ①运… II . ①周… III . ①运气 (中医) - 中国 - 清代②
运气药诀 - 研究 IV . ①R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086 号

《运气药诀》释义

主 编：周德生 李美珍

出版发行：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编辑部电话：0351-4922073

发行部电话：0351-4922121

电子信箱：cbszzc 2643@sina.com

印 刷：太原彩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154 千字

印 张：5.7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978-7-5377-3774-6

定 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传统医药学至明清时代已达到巅峰状态，历代医家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医药学专著。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客观上减慢了传统科学的发展速度。此后的传统医药学在与西医药学的并存、融合、争鸣、排斥中，或多或少地受西医药学的影响，尽管也涌现了许多医药学专著，但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而公认的观点是，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大环境氛围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本身的某些理论常被医药学借鉴发展，形成了中医药理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框架，诸如阴阳五行学说，而且传统文化的某些深层次思维特点，比如重整体、重类比等，都对传统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传统文化更像是一种符号被束之高阁，只可远观，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在今日变得难以理解，就更谈不上是传统思维模式的培养了，此种窘态是传统中医药学，也是一切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老手艺”难以有效传承发展、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从这层意义上讲，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并借以形成适合中医药的传统思维，是无奈中的必行之举。要培养一批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把中医药事业的基因传承下来，必须多读传统中医药临床名著。今天，我们要学习纯正的传统医药学，发展现代中医药学，传统中医药临床名著特别是著名医药学家原创性专著，仍然是掘之不尽的金矿。为了使现代中医药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从业者们以最小的阅读量获得最大的阅读效果，宏观了解传统中医药学成就的概貌，和掌握传统中医药学的精华，我们汇集了6种传统中医



药临床名著，作为《传统中医药临床读本丛书》第二辑，由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奉献给同道。

本丛书的遴选宗旨是：尽量以临床实用为落脚点；尽量包括反映不同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的医药学著作；尽量选择临床医药学家原创性的小部头著作；尽量选择资料信息量大的汇编性的较大部分著作；尽量选择内容通俗可读性强的学术性著作。

分册内容：（1）运气要诀（清·吴谦）《运气要诀》（1742）为《御纂医宗金鉴》15种之一种，阐《素问》五运六气之理。盖运气虽不可拘泥，亦不可竟废，故将《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相关内容归纳成歌诀并加以注释，便于记忆诵读。书中附有24幅插图，以便于读者领会。（2）临证指南医论（清·叶桂弟子）《临证指南医论》（1746）系叶天士诸弟子和后人20余人在《临证指南医论》共十卷89门之后分别附录的按语，对疾病的病机理论和辨证论治规律作出了发挥。叶天士名著朝野，因治好了康熙康皇帝的搭背疮，御赐“天下第一”。《临证指南医案》乃无锡华岫云等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辞简理明，“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被称为临证医案之范本，其后如吴鞠通、王旭高等均受此影响而化裁出《温病条辨》诸多名方和治肝三十法。附：西溪书屋夜话录（清·王旭高）为王旭高总结叶天士治肝经验，将杂病治肝分为肝气、肝风、肝火三纲，以及侮脾健胃、冲胸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等复杂情况，根据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确立了治肝三十法，并列出具体用药。正是胸中有古书又善于化裁者。（3）古今名医方论（清·罗美）。《古今名医方论》（1675）共四卷，共载方136首，每方先载方名、次主治、次药物及服法，最后选有代表性的古今名医成无己、赵以德、吴鹤皋、张景岳、赵养葵、喻嘉言、薛立斋、李士材、程郊倩、张璐、柯韵伯、程扶生诸家有关此方的论述，删繁择要，选辑补漏。全书详论药性，君臣佐使的配伍法度和方剂命名之义；复论方剂适应证的内外新久之殊、寒热虚实之异；



更引诸方而比类之，又推本方而互通之；论一病而不为一病所拘，明一方而可得众方之用；游於方之中，超乎方之外，全以活法示人。

(4) 要药分剂（清·沈金鳌）。《要药分剂》（1773）共十卷，为《沈氏尊生书》的组成部分。共选489种药物，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剂进行了分类阐述，分别对各药的性味、有毒无毒、阴阳五行相生、升降浮沉、七情、主治、归经、前论、禁忌、炮制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将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在该药前论、炮制、主治项下以“鳌按”的形式进行了阐发。该书收罗广博，取精用宏，“欲阅者晓然于药之各有其性，因各有其用，庶临症时可无背云尔”。(5) 药症忌宜（清·陈澈）。《药症忌宜》（1872）二卷，现存清刻本及《珍本医书集成》本。本书根据不同的病理情况，将病症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阳虚、阴虚、表虚、里虚、阳实、阴实、阳厥、阴厥、上盛下虚、心虚、肝虚、脾虚等50门。每门中又分列多种病证，每种病证均选列应用药物，并对这些药物的药性、功效及药物的宜忌作相应的论述，末附诸病应忌药总例，综述各类药性。(6) 厘正按摩要术（清·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求》（1889）为清代医家张振鋆《小儿推拿秘诀》（明·周于蕃）基础上，结合自己20年临证经验，删证纂辑而成。全书四卷，介绍了各种按摩手法、儿科推拿取穴及手法图说，以及内服、外敷药物疗法。书中所载“胸腹按摩法”，更为其他医书所鲜见。访书内容宏富，持论简要，是一部较有价值的小儿按摩专书。

每分册原文均选用相应的善本为基础，并较以近世出版的点校本，导读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编撰。力求使必读之书成为可读之书，有用之书成为能用之书。

《传统中医药读本丛书》编委会

策 划 赵志春 周德生

总 编 周德生 陈新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成瑞	马 锋	尹京湘	王 烨	王仙伟
王佳君	王胜弘	甘沐英	田金富	龙斯琪
刘丽娟	孙文艳	孙晓鹏	朱 婷	纪传荣
余艳兰	吴勇军	张 希	张志国	张依蕾
张雪花	张超群	李 媚	李 岚	李 珊
李美珍	李 康	李 萍	李煦昀	杨 洋
杨 磊	陈 艳	陈 莎	陈 瑶	陈 兴
陈学裕	陈 晖	周 俊	周 海	周文华
周德生	明 霞	易 琼	林萃才	姚欣艳
胡 华	胡 伟	胡常玲	胡盛松	奚吉湘
殷 剑	聂志红	贾海鹏	陶文强	高云峰
高立凡	高晓峰	寇志刚	曾繁勇	黄 雄
黄小锋	黄仁忠	喻 翩	葛云鹏	谢朝晖
谢刘松	曹 臣	谭 静	谭光波	
秘 书	肖志红	赵彦琴	刘 峰	



导 读

一、吴谦与《运气要诀》

本书原作者吴谦生于 1689 年，卒于 1848 年，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医宗金鉴》是清代御制钦定的一部综合性医书，全书 90 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简要的一种。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 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匱要略》的 20 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两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 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注》8 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运气要诀》一卷为《医宗金鉴》第五册。《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



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

《运气要诀》为《御纂医宗金鉴》15种之一，阐《素问》五运六气之理。是独立一部相当成功的具有权威的参考读物，刊行于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是当时官方权威机构编撰的一套医学丛书中的独立成篇的经典。在《凡例》中，编者御医吴谦等人对《运气要诀》一部作了以下说明：“天时之不齐，民病所有生也。《素问》言五运六气特详，医不明此，则不识亢害承制、淫胜郁复之理，不足称医之良也。但经文散见诸篇，学者每有望洋之叹。今搜集成篇裨将一览无遗，遮易于融会贯通。”五运六气学说虽然见于《内经·素问》，但是无专门论述，只是散见于各篇，学者难于登堂入室。本书将《内经》中有关运气推算的学说编撰在一起，并辅以详图和注释，使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一目了然，大大地方便初学者的专门学习和研究。《运气要诀》的最大特点是，为了便于学者的记忆和理解，是以歌诀的形式（一般七言八句）将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一一加以介绍，弃其偏驳，录其精粹，简明扼要，易诵易记。

二、关于五运六气学说起源与历史沿革



五运六气理论即五运六气学说，是专门研究气象变化与时空、气象变化与物候、气象变化与人类生命规律（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关系的专门知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医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时刻对人体产生影响，人体亦随自然界气候的改变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五运六气理论基于这种“天人相应”的学术观点，从整体角度和宇宙节律方面把自然气候变化与生物生命现象统一起来，从而探讨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关系，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运六气，简称“运气”。“运”是运动、运行、运化。即运动变化的意思。指木、火、土、金、水五个阶段的相互推移；“气”，古代人们认为是构成宇宙本元的基本物质，指风、火、热、湿、燥、寒六种气候的转变。中国古代研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界的动植物生长发育、水旱蝗螟，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种类，甚至人类社会的吉凶悔吝、禨祥灾异等方面影响的学说。运气指木、火、土、金、水等五行和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等六气，故又称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学说：简言之是研究“气”的运动、变化的学说。具体来看，是中医学在探讨天时气时气象运动规律的一种学说。任应秋氏认为“五运六气学说”即古代的医学气象学。五运六气学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时”，一个是“气”。“时”是指时令季节，包括各种不同的时间节律；“气”是指气候变化，包括各种不同的气候活动和气候特征。时令季节与气候变化有着客观规律可循。医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时令变化一般规律，在考察气候变化正常与否，进一步使人体为之适宜。《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即不违背天气时令，不违反六气的宜忌，不助长胜气，不助长复气。这才是最完美的治法。但只有认识和掌握时序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客观规律，人们才能做到“无失天信，



无逆气宜”。五运六气学说认为,根据天文历法可推算出一个具体年度和季度的气候、物候、人体生理反应及疾病流行的情况,并据以决定防治方针。对这一学说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赞同者以其预测发病规律,并据此进行疾病分类,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等;反对者则认为以天文历法推算气候的变化和疾病的發生必然命定,且忽略了地区差异。

五运六气学说的起源,至今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起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灾异说”;有人认为出自两汉望气,推步家之手;有人则认为“系唐代道家所伪托”。这些看法,在时间和学科归属上相去甚远,但其共同之处则是皆把运气排斥于医学之外,这就严重影响着对这份宝贵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要搞清其源流还是要从他们的起源开始。

“六气”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医和在论及病因时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害”。这里第一次提出“六气”之名并以之作为致病因素的是医和,也就是说是医家。医和六气的内容与运气六气虽有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①医和六气在天,为天空中出现的事物和现象,②医和六气的运动、作用和运气六气一样,也是六气在天,下降于地而生五色、五味、五声,③六气正常敷布即为一年四时五节,反常则成灾害而能致人于病。因此,可以说医和六气即是运气六气之本源。但是,医和六气与运气六气亦有不同,这就是,医和六气并非单纯气象因素。如果说医和所云“阴”、“阳”尚可理解为寒、暑二气的话,而“晦”、“明”则只能理解为“昼”、“夜”,则医和六气实仅四气。此外,医和六气亦未与五行有明确的关联。嗣后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6年)郑子太叔论礼,述子产之言,乃有:“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的记载。此时



“六气”与“五行”相提并论，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天之六气与“地之五行”是相互为用的。正如孔颖达在注释医和之言所说。“物皆有本，本自天来，故凡言五者，皆由阴阳风雨晦明生也，是阴阳风雨晦明，合杂共生五味。而在医和论六气前约三十年，单襄公在为其子顷公所留遗嘱中指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襄公“天六地五”说虽为论“文”而言，但古人制礼、定仪，皆法天地而立教，所谓“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是也。故襄公之言表明：公元前六世纪初，人们已经懂得：类分天空中的事物和现象，当以“六”数为标准区分地上事物和现象，应以“五数为准则。我们从历来标记日月运行如六十甲子日，一年十二月，天空十二次等等，记地方位、万物则用五方、五色、五味、五谷、五虫可知，“天六地五”的认识由来已久。这种“天六地五”、六气五行合杂以生万物的思想，应是五运六气学说“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以及五运六气相合以生万物思想的起源。

医和六气说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记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自然观和政治理论的《管子》一书，对“气”有进一步的认识。《管子》将一年分为五个时节，分别以“五和”、“八举”、“七举”、“九和”、“六行”指称之，并与方位、音、色、兽等对应起来。“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此居图方巾。”“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此居于图东方方外。”“七举对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此居于图南方方外。”，“九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以介兽之火爨……此居于图西方方外。”“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音，治阴气，用六数，次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此居于图北方方外。”这里的“气”只有五种，分别为和气、燥气、阳气、湿气、阴



气。并分别与色、味、音、兽、数联系起来。且其联系方法仅个别处与运气联系法略有不同，总的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对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晰的认识。《管子·四时》篇中则更进一步把春、夏、秋、冬四时与五方、三光、五行、五气、人体、日干结合起来：“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善羸而发出节……故春丹以甲乙日发五政。”“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人与气……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以风雨节土勘，土生皮肌肤……春羸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是故秋三月以庚申之日发五政”“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这里的五气又出现风、寒二气，则《管子》书中的气候当有阴、阳、风、寒、湿、燥、和七种名称。将阴与“寒”合并，以“暑或“热”代替“阳”，则得寒、暑（或热）、风、湿、燥、和六气。我们从《管子》所论已将日月星辰与五行、五色、五春、五兽结合起来，且其用词与运气亦较接近看出：五运六气理论与其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六气的成熟与定型：遍观先秦诸子，进一步阐述六气与人体疾病关系的著作只有医家类的《黄帝内经》了。《素问》早期篇章对六气的产生、作用、与五行的配合、与人体脏腑组织器官的联系，均有明确的论述。六气之名，虽因五行的影响而作“五气，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本有两种说法，一为“风、热、湿、燥、寒”，一为“寒暑燥湿风”。名为“五气”，实具六名。暑热同类，却不尽同，是以后人并存而为六气。笔者却以为这是上古气候偏温造成的。我国气候，据竺可桢氏考证，五千年来逐渐变冷，三千年前，即从原始社会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时代，“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1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出3℃~



5℃”据古籍记载，殷周之际的黄河流域到处是竹林遍野，象兕出没，气温、雨量较今为高。由于对气候的认识总是积祖辈流传的经验或记录而得，因此，六气中暑热并存报可能是上古气温偏高的反映。

和六气相比，五运理论出现较晚。“五运”一词，最早见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邹衍，其著《终始》、《主运》等篇十余万言。《终始》谓五行之德转移迁复，终而复始，因而历代帝王要依五行之德变易人事。这种理论充满唯心论色彩，主要用意在为统治者效劳，但终始五德之运也给人以启发，表明五行生克规律在时间过程中也起作用，这就使五行学说不仅可用以解释万物间的相互关系，也可用以解释时间过程，丰富了五行学说的内容，扩大了五行学说的应用范围，指导人们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去认识复杂的事物和现象。气候现象正是发生在天地之间而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复杂事物，有了五运理论，才有可能从时间、空间两方面运用五行生克解释之，可以说，五运理论是最终形成五运六气学说的关键环节。

但是否运气五运起源于自邹衍五运呢？又不是。对比两种五运可以看出；邹衍五运以相克之序发展，各运中间并无固定的时间间隔，推演五运的目的在于徵验人事之兴替；而运气五运却以相生之序发展，每运之间有固定的时间间隔和周期，推演五运的目的在于认识自然界事物的规律和变化。因此，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和概念。运气的“五运”、“主运”名词虽可能借鉴于邹氏，但其实际内容仍来源于《黄帝内经》的早期篇章《素问》其他篇章已在应用五行理论解释时间了，如《四气调神大论》之春生以奉夏长，秋收以奉冬藏，《金匮真言论》之“四间之胜”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脏气法时论》之一年五季、一旬十日与五行的配合等等。这些论述的共同之处是：相承时间节段互为相生关系，每行所主时间长短相等。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年与年之间，就必然是以五行相生之序逐年变化，即运气的“五运相袭而皆治之”，



“终期之日，周而复始”。这是运气五运理论导源于《黄帝内经》早期篇章而非出自阴阳家之手的有力证据。

其他学科知识对运气形成的影响：五运六气学说讨论气候对人体生命、疾病的影响，而气候是受多种因素控制的复杂事物，认识这一事物光靠医生的观察是不够的，它还要接受、吸取天文、历法、气象学知识乃能建立。战国以来，我国的自然科学有着长足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我国天文观测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系统的记录，很早使用二十八宿、十二次、十二宫等天空区划认识日月五星的运行。因而早在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便发现了岁星超辰现象。据近人张汝舟氏考证，《汉书·律历志·次度》所记二十八宿之距度、二十四节气之序乃是汉以前三百至四百年的天象资料，因此可知战国时期已有二十四节气之名，只是春季有四个节气次序与汉后次序略有不同。二十四节气的制订为认识气候至与不至、太过不及提供了比较的依据，因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最终形成有重要作用。我国的历法，汉以前已有六种，通称“古六历”，史书载汉初承秦制，仍用《颛顼历》，张汝舟氏根据大量天文材料证明：《颛顼历》也是四分历法，即岁实为365又4分之1日，以十月为岁首、以正月朔旦立春日为起点计年的历法。该历法各岁以天干地支的别名岁阳岁名为代表，实质上就是干支纪年。张氏引用了大量史料证明我国干支纪年始于战国时创立的《殷历》，这个历法的近距为周考王十四年（公元前427年），以正月为岁首，以岁阳岁名结合纪年。用此历法上推我国各年干支，上至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下至今日一丝不乱，就在于战国期间绝大多数诸侯国及秦汉间所用历法，其实质均为干支纪年法。

五运六气学说将气运变化落实到疾病的发生和防治上，侧重讨论气运变化对生物生命活动的影响和诊治原则和方法，因此，只能属于医学内容。考其起源，最早论述气候与疾病关系的是古代医家系统讨论气运产生及综合考察气、运、疾病的只有医学经典——



《黄帝内经》，因此，运气的起源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的医疗实践活动和古代卓越的医家，而非言吉凶、定朔闰，推交食的望气、推步之人。是以扰攘之博学，亦称“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不能不令人深思。

五运六气理论的发生受古代哲学思想和认识方法的影响，五运六气学说是在中医“人与天地相参”的整体观指导下产生的，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气象医学理论，源于《内经》，形成以“七篇大论”的成文为标志，成书年代以隋代或唐初的可能性最大。但对于运气七篇是否为《素问》原文以及其创作时间，自宋以来一直争论不决。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认为运气七篇是《内经》原文，写作于西汉以前或战国时代；其二，认为不是《内经》原文，写作于东汉，为王冰移入《内经》；其三，运气七篇是王冰自撰并窜入《内经》；其四，不考虑运气七篇是否为《内经》原文，但肯定它是创作于汉以前的古代文献。关于五运六气学说发生的背景，阴阳五行观是其发生的哲学背景；天干地支的应用，使五运六气理论的确立成为事实；天文知识的积累是五运六气理论形成的客观依据；实践贯穿于该理论全程的各个层面。

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应当形成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开始用干支纪年的方法之后，其首次公之于世当是王冰《素问》次注的“七篇大论”，从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载的120余字，到西晋王叔和《伤寒例》所引《阴阳大论》720余字，都无法反映内容博大的运气内容。因此，是王冰第一次将五运六气学说完整系统的内容奉于世人乃至后学的。王冰从其师藏“秘本”发现了“七篇大论”。并予以详细的考校疏注，使运理论完整系统地成为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王冰又“别撰”《玄珠密语》，“以陈其道”，同时还有专述运气的《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及专述根据气运变化规律而处方用药之《元和纪用药》等最早一批羽翼“七篇大论”的运气专著问世，奠定了运气理论的基础。



北宋嘉祐时期的仁宗皇帝于运气之学亦有所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也”（《孟子》），故高保衡、林亿、孙兆等人在对王冰次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尤其是“七篇大论”予以“重新校正”时，使五运六气学说在宋代有所发展。据《宋以前医籍考》记载，宋赵从古曾撰《六甲天元运气钤》一卷。另外在林亿等人校正《素问》时已出现王冰次注《素问》时所亡佚的第七十二、七十三两篇。虽有人认为这是北宋运气学家刘温舒所补或者出自“王启玄之后，刘温舒之前”（周学海《内经评文》），其内容仍为专事运气一此时，刘氏还著有《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凡三十论七十二图，专设《素问》六气治病之要。金元时期刘完素（字守真，号河间）撰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因《素问·至真要大论》。详言五运六气盛复之理，而以病机十九条附于篇末，乃于十九条中采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以为纲领，而反复辩论以申之。凡二万余言，大旨多主于火。”《郑堂读书记》认为刘完素“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因以《素问·至真要论》所例病机十九条，采取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七十七言，位归五运六气首为五运主病，次别六气为病，分风、热、湿、火、燥、寒六类，详论天地运气造化自然之理。二万余言，仍以改正世俗谬说。虽不备举其误，其意足以明矣。虽未备论诸病，以此推之，则识病六气阴阳虚实。几乎备矣。盖求运气言象之意。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人旨多主于火，故喜用寒凉之剂”（《宋以前医籍考》）。刘完素还有《黄帝素问宣明方论》十五卷，其问亦杂有以运气论临证用方。在此时期，科学家沈括对五运六气理论也有研究。故他于《梦溪笔谈》中对如何正确地学习和对待五运六气学说曾有数次公允科学的评价。可见，两宋金元时期把五运六气学说的研究引入到指导临证对病机的分析和临床处方用药，使这一理论为临床实践服务。

明代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对“七篇大论”中五运六